

（二〇一七年七月十七日出版）

---

本期目录

---

【春秋史笔】	从支持、利用到否定、抛弃	
	——从毛泽东对聂元梓态度的变化看造反派领袖的结局	舒 声
【往事非烟】	我在八中的红卫兵岁月	朱松滨
【史海钩沉】	清华大学7 2 7事件（六）	胡鹏池·但 榮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

【春秋史笔】

从支持、利用到否定、抛弃  
——从毛泽东对聂元梓态度的变化看造反派领袖的结局

• 舒 声 •

毛泽东是中共中央主席，聂元梓只是北京大学一个系的总支书记，如果不是1966年5月25日那张大字报，毛泽东可能永远不会知道聂元梓。而正是那张大字报，让毛泽东找到了点燃文化大革命烈火的机会，并把聂元梓抬到了文革造反派领袖的高位，让她闻名全国。然而，两年后，又是毛泽东本人，把聂元梓等一帮造反派领袖拉了下来。1968年后，聂元梓等人逐渐失宠，不仅失去了权利、地位，而且失去了人身自由。

本文旨在记述毛泽东对聂元梓从支持、利用到否定、抛弃的过程，并对其中的原因进行探讨分析。

一、毛对聂大力支持，让她成为文革的宠儿

1966年5月，在北大社教运动中受到挫折的聂元梓心情很郁闷，她被下放到北京郊区怀柔县搞农村四清，中间回学校取衣物，在火车上感冒了，因为治病休息，没有及时回到怀柔，正赶上传达“五一六通知”，该文件点了彭真的名，撤销了“二月提纲”，要求“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批判“混进党和政府、军队和文化领域的各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政治敏感性很强的聂元梓受到了“五一六通知”启发，知道彭真已经倒了，陆平和彭真是一条线上的，肯定保不住，彭真后面也许还有更大的。她先后找到哲学系总支副书记赵正义和党员教师宋一秀、杨克明、高云鹏、夏剑勇，讨论写大字报，并通过张恩慈联系，到友谊宾馆向曹轶欧做了请示，得到曹的同意。5月25日午后，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珏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什么”的大字报贴到了大饭厅的东墙上。这张大字报在北大引起强烈反响，反对者甚多，当晚李雪峰来到北大，强调“内外有别”。大字报抄件由张恩慈送交中央文革〔1〕。6月1日，毛泽

东在登载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的《红旗》杂志和《光明日报》总编室5月27日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13期上批示〔1〕：

康生、伯达同志：

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

毛泽东 六月一日

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广播了《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从此，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966年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聂元梓和杨克明、张恩慈列席了这次会议。会议期间，毛泽东接见了聂元梓等三人，康生、曹轶欧参加了接见。“毛主席问我是哪里人，问了我的经历什么的，他表扬我们的大字报写得很好。毛主席还指示说，北大应该成立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组织，要我负责成立北大文化命委员会的工作。”〔2〕

1966年8月5日，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突然拿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把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并将其作为向刘少奇开火的一颗炮弹。毛泽东兴奋地写到：“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之后，笔锋一转“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把矛头转向刘少奇和地方的“走资派”，称“他们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又何其毒也！”并“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的形左实右”，和他们老账新账一起算。一褒一贬，在这张文字不多的大字报中，毛泽东的态度十分明显。

1968年8月中旬，当选了北大校文革主任的聂元梓春风得意，公然请毛泽东给改版的北大校刊题写刊名，毛泽东也真给面子，连续两次题写了“新北大”三个大字，并谦虚地在信里写道“如不好，可再写”。消息传到北大，校园里锣鼓喧天，热烈庆祝，最高领袖给一个学校的校刊题写刊名，恐怕是空前绝后的了！

毛泽东不仅支持聂元梓，还十分关心北大的文革，派女儿李讷来北大和聂元梓联系。

1966年11月12日上午，李讷到北大校文革找聂元梓，正好聂不在，李讷说下午两点再来。下午李讷准时来了，聂元梓和校文革的工作人员孙蓬一、姜同光、李清昆、李玉英、陈葆华、傅治文等一起和她见面。李讷说要和聂元梓单独谈。李讷说：“主席批评了我，主席问我最近到北大来了没有？我说去了，主席问我见到聂元梓了没有，我说没有。主席批评我说，你去北大为什么不去看她呢？今天，主席特地让我来看看你，问问你最近在干什么，想些什么？”聂元梓请李讷代她向毛主席表示感谢，并汇报了学校运动的情况。

第二天，即11月13日，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李讷又到校文革办公室找聂元梓，并说快下班了，我陪你回家去谈谈，也看看你的家。到了聂家后，李讷对聂元梓说：“你昨天谈学校的情况和问题，我都向主席汇报了。主席说，学校的事情不多，聂元梓想出去走一走，好嘛，可以出去。上海和外地的运动比北京开展得晚，现在一些地方群众运动发动得不够好，领导不够得力。主席同意你去上海串连，还希望你多走几个地方。”李讷还说：“你出去串连不能同一般学生、教员一样，到处跑跑看看，你要宣传主席的思想和路线。你可以带几个人同去。”〔3〕

毛泽东亲自派李讷来北大，指示聂元梓去上海串联，表明他当时对聂元梓是多么信任，也是利用北京的造反派去冲击运动相对落后的上海的一步棋。聂元梓接受了毛泽东的任务，带领亲密助手孙蓬一等人，11月19日到达上海，直到12月16日回到北京。在上海期间他们支持上海造反派炮打陈丕显、曹荻秋，在华东师大批斗常溪萍（后被迫害致死），并见到了张春桥和工人造反派头头王洪文、潘国平等，支持他们反对上海市委，起到了十分恶劣的作用。

## 二、聂元梓利令智昏，毛泽东对她失望

1967年初，受到上海“一月风暴”的鼓动，聂元梓也企图在北京夺权，先后和蒯大富、王大宾等联系，准备成立《北京革命造反公社》，还和李敦白等在广播事业局成立了夺权联络站，拉着李敦白做游说工作，让别人拥护她为核心，以为只要通过电台广播，北京夺权就大功告成。同时，她指派北大学生到华北局、高教部、民委、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等单位到处活动。在夺权活动中北大和其他高校的造反派组织发生争斗，逐步形成所谓的“天派”、“地派”，聂元梓与中央文革某些成员和毛泽东派到北京的谢富治也逐步产生矛盾。4月12日晚，由她的得力助手孙蓬一在北大万人大会上公开炮轰谢富治是“摘桃派”。1967年4月20日，北京市革委会成立，聂元梓成为副主任，但她并不满足，经常和谢富治“斗法”，争吵，这些情况不可能不反映到毛泽东那里去，使毛逐渐对聂元梓有了看法。

早在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领导人卡博和巴卢库时就说：“去年12月，今年1月，有一些就分化了，有一部分夏季是革命的，冬季就变成反革命的。当然，聂元梓、蒯大富这两个人，我们是在那里做工作，说服他们。但是这种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我们还要看。”〔4〕表现出对聂、蒯的怀疑态度。

1967年3月，由于聂元梓在整风中拒不接受群众意见，打击排挤不同意见的干部教师，甚至校文革内部的成员，北大校内逐步出现一些反对她的群众组织，到8月17日，这些组织联合起来，成立了《井冈山兵团》，得到了社会上的广泛支持，而聂元梓在社会上的名声越来越差，她的外号“老佛爷”也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当年夏天，毛泽东突然说要让陈伯达去当北大校长，这也许是句开玩笑的话，但反映出毛对聂已经不信任了。

到了1968年3月，聂元梓和校文革看到校内反对派的势力越来越大，决定用武斗的方式镇压和消灭之，3月29日凌晨，他们组织武斗队伍手持长矛、棍棒将睡梦中的《井冈山兵团》骨干——化学系学生从居住的31楼强行赶出，打伤多人，开创了北京高校大规模武斗的先河。接着，蒯大富有样学样，在4月份发动了清华大学的武斗，并使用了枪支、手榴弹、土坦克等，两派在武斗中死亡10多人，受伤数百人；而北大有3名无辜学生被聂元梓手下打手活活打死。毛泽东先是静观其变，直到7月27日，才派出3万多名工人进入清华制止武斗，蒯大富不知工人是毛派出的，以为有“黑手”操纵，拼命抵抗，又打死工人5名，打伤几百名。7月28日凌晨两点多，入睡不久的毛泽东被周恩来的电话叫醒，当得知清华流血事件后，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脱口而出：“造反派反了”，随即决定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五大领袖”。

关于这次召见时的记录已经在社会上广为流传，这里摘录毛对北大和聂元梓的有关讲话（根据韩爱晶编著《清华蒯大富》，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

在蒯大富未到之前，毛说：“本来新华印刷厂、针织总厂、中央警卫团是我派去的，你们就给吹。我问他们怎么对待校园的武斗，我说你们去做做工作看看。结果去了三万人，其实他们恨北大不恨清华。”——笔者评：毛为什么说工人恨北大不恨清华呢？恨北大实际上是恨聂元梓，因为她是北京高校武斗的始作俑者，在北京市群众中影响恶劣，这点毛很清楚。

“你们北京大学要那么大干啥？如果解决不了，不一定住在一个城市，一个住在南方，一个住在北方，都叫新北大，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井”，在一个城市打一个括弧“公社”。就像苏联共产党打一个括弧“布”，另一个苏联共产党打个括弧“孟。”——笔者评：可见毛不同意聂元梓消灭反对派，主张两派共存。

“你们搞了两年了，一是斗，二是批，三是改，斗是斗，你们是搞武斗，也不斗也不批，也不改，现在是少数学校搞武斗，人民不高兴，工人不高兴，居民不高兴，部队不高兴，多数学校学生也不高兴，就连拥护你的那一派也有人不高兴，就这样一统天下？您新北大老佛爷你是多数，是哲学家，新北大公社、校文革里就没有反对你的人哪？我才不信呢！当面不说，背后还是说怪话。”——笔者评：毛泽东批评了聂、蒯搞武斗不得人心，讽刺了老佛爷是“哲学家”，事实上聂元梓并不是一统天下，新北大公社和校文革里反对聂元梓的人也很多，这点毛说的很准。

“现在的逍遥派那么多，现在社会上说聂元梓、蒯大富坏话的多起来了。聂元梓炮灰不多，蒯大富的炮灰也不多，真的打起来，有时候三百，有时候一百五，哪里有林彪、黄永胜的那么多，这回我一出就三万多。”——笔者评：毛也知道聂、蒯在社会上不得人心，说他们的炮灰不多，实际上聂的炮灰也就是几百人，武斗期间大部分师生都离校了。

“我看这个大会堂很多空地，中南海地方很大，接待四五万红卫兵，办个学校行不行？或者你聂元梓来，或者侯汉清来。你们不是杀牛宰猴炖羊肉吗？牛是牛辉林，猴是侯汉清，羊是杨克明。这三个人我知道杨克明，杨克明也是个年轻人嘛！到过十一中全会，那张大字报杨克明帮了忙。你们这张大字报分成了两家，这种社会现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谁料到会打起来呢？……我看高中、高小、初中基础课跟大学差不多，这专业课先生都不大懂专业，哲学家讲不出哲学。你聂元梓不是哲学家吗？”

聂元梓说：“我不是哲学家。”

江青打趣说：“她是老佛爷。”

——笔者评：毛的记忆力很好，北大井冈山的头头名字都知道，还记得杨克明参加过八届十一中全会，是第一张大字报作者之一，认为北大分成两派是很自然的，并再次讽刺聂元梓是哲学家。

聂元梓说：“牛辉林很坏，他父母与彭小蒙父母有关系。”

江青说：“在政治上，我们对你们都是有政治责任的，帮助你们不够，你们自己去搞，各抓各的，抓出黑手，搞联合。”

聂元梓说：“井冈山，下山一千多人，正在办学习班。”

毛主席说：“你那下山的人靠不住，你那里井冈山大多数人身在曹营心在汉，身在你老佛爷，心在井冈山。不要去搞牛辉林，让他们回山去，有自由，不勉强，不要侮辱人家，尤其不要打，不要搞逼、供、信。我们过去是犯过错误的，你们初犯错误，也怪不得你们。”

——笔者评：聂元梓在毛泽东面前说谎，毫不脸红，但毛不信她的谎言。

江青说：“樊立勤怎么样？”

聂元梓说：“没有搞他，他和彭珮云反革命集团搞成一块。”

毛主席说：“牛辉林，把他看起来了吗？”

聂元梓说：“他内部看的，一部分同意，一部分不同意。”

毛主席说：“侯汉清是学生，还是教员？”

聂元梓说：“是研究生，他父亲在63年搞投机倒把。”

江青说：“最坏的，不是他们，是几个组织联起来的，里边有坏人，有外国特务，他们还搞什么单线联系。”

聂元梓说：“他们是井冈山、红旗飘、零等联合起来的。”

毛主席说：“这个作风不好，飘、零、井、红，应该变成团、零、飘、红，他小，可是他厉害。”

——笔者评：聂元梓不是一贯标榜自己不搞血统论吗？在这里污蔑樊立勤、牛辉林和侯汉清，并涉及到家庭。说侯的父亲搞投机倒把，是什么意思？与侯汉清本人有什么关系吗？何况“投机倒把”也算不了什么问题。

毛泽东说：“你们那些材料我都看过。聂元梓，侯汉清你们还没有提他们是反革命嘛？”

聂元梓说：“侯汉清在社会上搞了一个反动集团，恶毒攻击主席、林副主席。”

毛泽东说：我们这些人受到一些污蔑不要紧，牛辉林纲上的不好，又不是什么大的政治问题……”

——笔者评：可见聂元梓已经给毛泽东和中央递送了很多关于牛辉林和侯汉清的黑材料，并当面污蔑侯汉清在社会上搞了一个反动集团，纯属无中生有，幸亏毛泽东没有轻信聂元梓的谎言，否则牛、侯等早就被抓起来甚至枪毙了，聂元梓身为一个高校干部，竟然诬陷本校的学生，其心何其毒也！

聂元梓说：“北大井冈山兵团有人要油炸江青同志。”

江青情绪激动起来，说：“我住的地方你们都知道，要油炸就油炸，要绞死就绞死。我们都是一块共过患难的，就不能容人家，将来还要治国平天下哪！你看你们不学习主席著作，不学习主席作风，主席向来是团结反对他的人。”

毛泽东说：“可以不提了，宰牛杀猴炖羊肉。牛可以耕田嘛！你们举例的罪状无非是攻击江青，攻击总理、林彪和我，统统一笔勾销。人家在小屋子里讲的嘛，又没有在外面贴大字报。”〔5〕

——笔者评：江青本来就是经常歇斯底里的人，聂元梓故意在江青面前挑拨，说北大井冈山有人要油炸江青，引起江青愤怒，以达到借刀杀人的目的，手段何其卑鄙！即使井冈山有人骂过江青，聂元梓又是怎么知道的？还不是靠“二组”使用特务手段偷听的。把偷听的情报送到中央，这就是聂元梓校文革干的事！

从以上毛泽东的讲话来看，他对北大文革的情况是很清楚的，也没有听信聂元梓谎报的情况，对聂元梓、蒯大富不按照他的战略部署搞斗、批、改十分不满，对红卫兵造反派已经失去信心，决定派工人和军队进驻学校。这次召见，是文化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标志着红卫兵造反派开始走下历史舞台。

1968年8月19日，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大，接管了聂元梓和校文革的权力。聂元梓的命运从此发生重大改变。

### 三、毛对聂彻底否定、抛弃

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北大，特别是1969年春8341部队进驻后，在北大组织群众揭发批判聂元梓和校文革的问题，包括挑动派性、对干部学生逼供信，挑起武斗等，两派群众都认为聂元梓和校文革问题严重。

但聂元梓和校文革的某些头头不服。

据谢静宜回忆：毛主席对聂元梓他们少数人的不服，非常生气，有针对性地批了聂元梓和校文革的领导人。

主席气愤地说：“你老佛爷伸手伸到石家庄，伸手伸到华北局，不知道羞耻！”

“你们自称是红色政权，你红在哪里？你就没有黑的吗？你们就是有黑的！”

“你们是大学，是有知识的人哪！才没知识呢！”

“你们是文明单位呀，才不文明呢！穿着盔甲，拿着长矛搞武斗，不知道羞耻！”

“你们说你们听我的话，你们听了么？我叫你们文斗，你们就搞武斗。我叫你们大联合，你们就搞分裂。我叫你们严禁逼供信，你们就把人往死里打。你们打的是好人还是坏人啊？你们打的是好人，而不是坏人；你们打的是阶级兄弟，而不是阶级敌人。”主席越讲越气愤，声音也越大，怒不可遏。

“你老佛爷是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

“文革，文革（指当时北大校文革），一不文化，二不革命，还革什么命啊？我看你们是一派的‘文革’，逼供信的‘文革’，武斗的‘文革’！”

主席当时气愤地从坐着批评，到站起来批评。他在厅中来回踱步，坐下对我说：“小谢，把我刚才说的这番话，在北大召开的全体大会上，由你去讲。”

我吃惊地抬头望着主席说：“主席，这是您老人家的话呀，我怎么能去讲啊？”

主席说：“能讲的，你变成自己的口气说就是了。”

不几天，在北大东大操场召开的几万师生员工大会上，我作为其中一位发言，讲出了毛主席批评的原话。

之后，来自各系的同志反映说：对此群众反应强烈，高兴，出了气。大长了群众的志气、勇气，灭了“老佛爷”的威风。（6）

中共中央中发（1970）17号文件“批发北京市革委会送来的北大宣传队关于斗批改经验总结的三个报告”中，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写入了：校文革在运动中、后期实际上变成了“派文革”、“武斗文革”、“逼供信文革”的语句。

由此可见，毛泽东此时（1969年）对聂元梓及其校文革已经持否定态度。

1969年4月，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为了体现文革的成绩和造反派的代表性，还是把聂元梓选成了候补委员。1970年9月，九届二中全会时，聂元梓又到处串联，紧跟林彪、陈伯达，学着陈伯达的腔调说：“反革命分子听到不设国家主席，手舞足蹈！”并和陈伯达一样，引经据典，大讲“天才”。在陈伯达被点名批判后，聂元梓也被迫检查，受到批判。

1973年7月17日下午，毛泽东接见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周培源陪同接见。毛对周说“你在文化大革命里，被整得快呜呼哀哉了吧？”又说“聂元梓这一派太坏了。”周培源说：“聂元梓当时猖狂镇压群众，因为陈伯达是她的后台。”毛泽东紧接着说：“林彪是陈伯达的后台”。（7）

中共中央中发（1976）4号文件传达《毛泽东主席1975年10月—1976年1月间的指示》中有这样两句话，一句是：“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另一句是：“老中青三结合，青有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8〕这两句话实际上就把聂元梓、蒯大富彻底否定了，这也是毛泽东生前对聂、蒯的最后一次指示。

从1968年—1978年，聂元梓一直处于被隔离审查的状态。1978年4月19日，她被北京市公安局正式逮捕，1983年3月16日，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17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4年。

#### 四、毛泽东对聂元梓态度变化原因简析

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分析：

##### 1、毛泽东对聂元梓的态度为什么前后变化？

毛泽东是一个雄才大略的革命家、政治家，在政治斗争中，他善于利用小人物，“以小制大”，例如1954年，利用小人物李希凡、蓝翎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1965年利用小人物姚文元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矛头都是指向更大目标的。文化革命是他酝酿已久的一件大事，但选择什么机会点火，需要捕捉时机，聂元梓的大字报让他捕捉到了机会，他决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这张大字报，是把聂元梓当成了他棋盘上的一颗棋子，或者说是打向刘邓的一颗炮弹，那时他需要聂元梓这个工具，对聂元梓十分支持，又是让她列席八届十一中全会，又是给校刊题字，又派她到上海煽风点火，就是利用这个小卒子往前冲。到了1967年全国全面夺权后，造反派的作用降低了，而且不那么听话了，反而经常给他制造麻烦了，他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不但对他们不信任，而且可能会引导他们犯错误，然后让工人、军队进驻学校取而代之。这不但是聂元梓的下场，也是蒯大富和全国所有造反派领袖的下场。“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也好，“始用之，终弃之”也好，1968年夏季，毛泽东和造反派领袖的蜜月期已经过去，聂元梓、蒯大富等还指望毛对他们信任、宠爱，只是可笑的一厢情愿而已。毛泽东生前，聂、蒯等已经失宠，被审查，监督劳动，毛泽东死后，痛恨他们的当年的“走资派”掌权，要否定文化革命，当然要否定这些文革时期的代表人物，收拾他们当然更不会手软。

##### 2、聂元梓自不量力，走向反面

聂元梓出身于河南滑县一个地主家庭，初中文化程度，1937年在其兄聂真的影响下参加革命，经历了不少政治运动，有一定的经验；但由于她素质差，人品差，水平低，又有投机心理和政治野心，在文化革命这个泥潭中，她自不量力，头脑膨胀，以为有毛的支持，便得意忘形，自以为是天字第一号造反派领袖，在校内镇压反对她的干部群众，在校外到处伸手，得罪了许多单位和组织；在她的身边还有一些抬轿子的人，无原则地吹捧她，使她看不清形势，利令智昏，竟然在首都这个全国政治中心发动武斗，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引得天怒人怨，使自己的形象越来越糟，这些信息通过各个渠道传到上听，使得毛对她的看法也越来越差。毛泽东在观察她和蒯大富等人一段时间后，认为他们已不符合他的要求，甚至影响到自己的战略部署，失去了继续利用的价值，所以决定将其抛弃，这是聂元梓们咎由自取，怨不得他人。

文化革命从1966年6月起，聂元梓、蒯大富作为造反派领袖，风光一时；可是仅仅两年，就从天上跌倒了地下，从文革的宠儿变成了被抛弃的垃圾，直到文革结束后成为阶下

囚。是他们的表演使自己从“英雄”变成了小丑，这是政治斗争残酷的体现，也是文革从盛到衰的一个标志，值得文革研究者深入研究。

注释：

- 1、聂元梓著，《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社，126页
- 2、《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62页
- 3、聂元梓著，《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社，151页
- 4、许爱晶编著，《清华蒯大富》，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导言，第1页
- 5、聂元梓著，《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社，172—174页
- 6、许爱晶编著，《清华蒯大富》，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363—372页
- 5、谢静宜著，《毛泽东身边工作琐忆》，中央文献出版社，183—184页
- 6、奚学瑶著，《周培源传》，143—144页
- 7、许爱晶编著，《清华蒯大富》，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410页

~~~~~

## 【往事非烟】

我在八中的红卫兵岁月

• 朱松滨 •

### ◇ 文革来了

实际上，文化大革命早就在酝酿了。在1965到1966年期间，北京中学的四清运动；毛主席与王海容、毛远新的讲话；我们学校高三年级某些班里出现的大字报、大辩论；其他学校不时传来的一些消息等等，文革的毛毛雨，我们在文革前夕就已经感受到了。

1965年的深冬，我父亲带我去故宫午门上面看一个展览，题目好像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成果展览”。我记得是个非常寒冷的傍晚，宽敞的大展厅里空无一人，只有父亲带着我，边看边听讲解。展厅陈列了一系列发生在中国农村的所谓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情况。午门之上，大殿之内，本来就灯光暗淡，阴森森的，形形色色的资料介绍，真让我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最让我惊讶不已的是一张照片，拍的是一个农村党支部成员的合影，他们个个都披挂着一身宗教袈裟，几个年轻一点儿的，还打着宗教旗番，香烟缭绕，好像在进行宗教仪式。这场景对我来说，见所未见，一个农村的党支部竟然整个都变色了！让我感到农村的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到了极其严重的地步，真有一种要“变天”的感觉。

我父亲是从来不带我们到什么公共场所的，更别说看展览，这次竟然不顾如此寒冷的天气，带着我爬到冻的像冰窖的午门上面看这样一个展览。我猜想，是他也觉得国家的政治形势已经到了风起云涌的紧急关头，作为一名军队的干部，不能不认真地去了解地方上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顺便也让儿子受教育吧。

1966年5月19日，中共中央下发了《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始。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们这才感到文化大革命真的来了。学校里开始出现大字报，矛头直指校领导。同时一些大字报展开了老师之间的揭发批判。对学校领导和教师的批斗也开始了。6月上旬，工作组进驻我们学校。6月、7月两个月，学校的运动主要集中于教职员揭发学校领导，而且是在工作组的领导下进行



的。每天总有大字报贴出来，总有批斗会，批斗学校领导，今天这些老师上台揭发、控诉，明天可能就有大字报揭发这些老师的什么事，弄的我们学生莫衷一是。学生们无非是被裹挟在这些活动中，跟着《人民日报》的口号和社论精神以及工作组的调子，摇旗呐喊。

我在这段时间里参加了工作组领导下的材料组工作。第一次住进了学校的集体宿舍，我渐渐和其他年级、班级的同学也熟悉了，绝大部分是干部子弟、军干子弟和工人子弟。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跟随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学校传达了团中央书记胡克实的讲话，说可以给工作组提意见。学校里开始出现批评工作组的大字报，不确定气氛下的文革运动有了新动向。

真正把北京中学生的文革积极性调动起来，应该是7月29日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集体亮相接见学生，我也跑去了。在这个大会上，我平生第一次见到如此多的党和政府领导人在一起，也是平生第一次如此近距离见到毛主席。先是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人讲话。然后突然台上的领导人都站了起来，侧幕拉开，毛主席缓缓走出来，全场掌声雷动。我当时觉得很振奋，但是并没有非常激动的感觉。我对毛主席身材魁梧、满面红光的印象还是非常深的。就是从这天起，北京的中学生才开始以主人公的姿态，站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前沿，好像也是那几天，工作组黯然离开学校。

近年有许多文章揭露、研究文革初期北京中学发生的打人、特别是殴打校领导和教师的事件。暴力殴打事件集中在哪一段时间里呢？想来想去对不准，我想应该是8月初工作组离开的那段时间，这段时间学校的管理突然瘫痪了，许多红色恐怖事件发生，北京的中学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我在八中的校园里见过几个低年级的女生打一个躺倒在地的人，还见过当时被批斗关押的温寒江校长和韩玖芳主任从楼道里拖出一个被打得满身是血的人……到现在我都不能原谅自己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站出来干涉一下，我也一直在追问自己，当时究竟是个什么心理？会如此麻木不仁？

#### ◇ 破四旧

中学生闹革命，革谁的命呢？可能受到五四运动的启发，北京一些中学突然兴起了“破四旧”，“四旧”是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于是街面上所有能和“旧”字沾边的东西就遭殃了。但毕竟街面上的“四旧”有限，“破四旧”很快就演变成了“抄家”，因为更多的“四旧”是与“四旧”沾边的家庭及深宅大院联系在一起的。我没有参加过“破四旧”，主要是自己的思想跟不上形势，十几年都住在干部宿舍院里，想象不出社会上有什么不得了的“四旧”。不过一天到晚看到许多“破四旧”的传单，有时候也挺激动，等跟上形势了，“四旧”早就被人家捷足先登“破”了。有一次在学校宿舍里，大家议论起来，怎么我们就想不出个招也破个什么“四旧”呢？记不清是罗旭东还是郝延塔，开玩笑地说，我他妈的干脆喝上一瓶白酒，乘着酒劲儿，到西单把个什么老字号的牌楼给砸了算了。

抄家我参加过一次，是抄我们班主任陶祖伟老师的家。1966还是1967年？只记得没有抄出什么东西。后来当形势比较缓和之后，陶老师来班上请求同学们归还他的一些东西，我们班还集体开了一个会，那时班上已经分成老红卫兵、四三派和四四派了，我坚决主张归还，可有些同学坚决反对，会议好像没有任何结论。

陶老师是我们的班主任，又是我们平时十分敬重的老师，可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辛辛苦苦培养教育多年的学生们竟然上门去抄了他的家！现在想起来，内心还是十分沉重。陶老师当时打成“反革命”了吗？似乎没有。我们班哪位同学与陶老师有仇恨吗？肯定也没有。但是这样的事情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就真的发生了。

我们这些年轻的中学生，怎么就会在那一天成为了那样的一群人？这难道不是那个阶级斗争教育灌注在我们血液中的毒素的发作吗？我想我的儿子对这样的事是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无法想象的。可是我们过来人决不能不面对那段历史，决不能默不做声。我们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把曾经发生过的事告诉后代，让他们警醒，使他们牢记，在他们身上，乃至世代代，决不能再发生类似的事情了！

#### ◇ 老红卫兵

我们八中有些班级在7月里就出现了红卫兵。红卫兵是一个中学生自发成立的群众性组织，没有什么加入的章程、程序和管理。是否参加红卫兵？开始我并不积极，因为对我们这些平时的“好学生”、团干部来说，这也太离经叛道了。可是进入8月，红卫兵在各个学校发展得很快，党中央又积极支持，我们也就成立了。根据那时红卫兵的成分要求，我是当然的一员。对我来说，成为红卫兵，至少表明了我个人的阶级属性和政治认同。从此每天参加活动，就以红卫兵的身份出现了。

我们班红卫兵做过的事情，有一件还留在我的脑海里。我们去一个民主党派的驻地，参加他们批斗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斗会。按理说中学生和民主党派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我们一个同学的母亲是这个民主党派的共产党支部成员，这个共产党支部希望能借红卫兵小将的气势，推进这个民主党派的文革运动，于是在和这个党支部开了一次会后，就安排了我们的这一次行动。在这个批斗会上，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和反动分子聚集在一起，跪在地上，一些人发言批判，我们就呐喊助威，还上去踹了跪在地上人的屁股。我记得被批斗的人里有吴晗。

还有一件事就更加荒唐了。既然“破四旧”没有做什么事，我们就想起了“取缔民主党派”的主意。现在陈小鲁担责说是他的主意，我也算是积极参与者吧。我们起草了一个《通告》，一天夜里，我、李勇，可能还有郝延塔，乘着一辆北京吉普去了北京市几乎所有民主党派的总部，敲开大门，向工作人员宣读《通告》，没收这些民主党派的公章。当时看着李勇深更半夜，站在冷清的机关院子中间，对着零星几个值班工作人员，一板一眼地宣读所谓《通告》，他那个认真劲儿，我心里着实想笑，感觉这家伙还真有一股钦差大员的派头，换上我可端不起这个架子来。回去后我们都得意的不行，自认终于做了一件很有政治意义的大事。

#### ◇ 辩论对联

1966年8月初，学校里展开了“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对联的辩论。这个对联从表面上看，明显违背党的一整套阶级路线，充斥着阶级歧视和对人格、人权的蔑视。但在实质上，又恰恰是党的阶级路线和阶级教育对年轻人思想意识的邪恶影响的必然反映。我作为一个共青团的干部，文革前这些年，经常苦恼的就是如何做出身不好同学的思想转化工作，对联的说法，我怎么可能认同呢？！那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过去的工作不都白做了吗？可是另一方面，这个对联所明确指出的“革命”和“反动”的阶级划分，以及所包含的强烈阶级斗争意识，不正是党组织多年来谆谆教导我们的吗？！那几天我的思想，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了巨大的困惑。

一次学校里开对联的辩论会，我，还有王鲁军、吴新潮、陈海洋，可能还有李大震，几个人一起跑上台，王鲁军代表我们发言，因为他是前一届的高中毕业生，留校担任团委工作，无论理论水平还是讲话水平都比我们高。我们表示坚决不同意这副对联，可是王鲁军的

发言无论多么“政治正确”，还是被台下一阵阵狂热的反对吼声打断。现在想来，当时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自圆其说，更勿论说服别人了。好在对联的辩论没有几天，就因中央文革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做了否定的纠正而平息下来。这期间还传出遇罗克的文章《出身论》里的观点。

“出身论”和“血统论”是针锋相对的，我们当时也没有对《出身论》抱有多少好感，因为这篇文章是对共产党阶级斗争学说的颠覆，自然得不到我们这些无产阶级后代的认同。现在我们认识到，遇罗克是在那个人性泯灭的年代里，第一个敢于挺身而出，为人性，为人权，为人类的普世价值而战的伟大的先驱。

围绕对联的辩论表面上平息下来，但是却深深触动了班上一些同学文革前就形成的心灵创伤，把过去同学之间由于阶级教育造成的裂痕彻底撕扯开来。一些所谓出身有问题的同学，从对文革的期待和热情，转向了困惑和沉默。以我文革前做团支部工作的经验，可以察觉出他们内心的痛苦。即使今天没有人会再提及家庭阶级出身，但是文革初期那一场场的对联辩论，把连接我们同窗情谊的大门彻底关闭了。

很快运动形势又有了变化。

从8月18日到11月底，毛主席十几次接见红卫兵，全国各地逐步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浪潮，将出身不好的或者出身一般、感受到歧视和不公平的同学们的反抗精神逐步唤醒和调动起来，他们的这种反抗精神，是又一次的火山爆发！支撑他们信念的是，你们老红卫兵不许我们革命，可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允许我们革命！现在许多老人怀念文革和毛泽东，恐怕与他们当时的这种情感不无关系吧？

遗憾的是这批同学发动起来，也只是重复我们老红卫兵走过的路。因为党的阶级斗争这条主线是须臾不能偏离的。前段时间我们批他们，反过来就是他们批我们。同学之间的界限分明、针锋相对仍然是愈演愈烈。当然毛主席的感召力还是巨大无比的。各个派别，无论分歧多大，都自称是坚决跟着毛主席闹革命。无论有多少派别，走的都是同一条路：专制，独裁，领袖政治和个人崇拜。不管用什么花言巧语去粉饰，这永远是一条通向悬崖的不归路。

当时坐火车不用花钱买票，各地都设立了红卫兵接待站，吃住也基本不花钱。我们这些从来没有独立出过远门的年轻人哪能坐得住？在1966年的8月底9月初，我、陈海洋、李大震、王鲁军，决定赴哈尔滨，因为陈海洋的姐姐在哈军工上学，我们自然会有落脚之处。这一路只记得哈军工坐落在松花江之滨，高楼绿瓦，远远望去，很是宏伟。

这一路有件事记忆犹新。我们到沈阳参加一次群众大会后，当地的红卫兵纷纷围拢过来，向我们这些首都来的红卫兵取经，学习如何造反。有个穿着干净整洁、略显单薄的男青年，趁着没人的时候突然走过来，郑重其事地对我们说，我是地主出身，但我坚决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和你们一起闹革命。听了他的话，我目瞪口呆，不知如何回应。多少天来围绕在我们周围的都是红卫兵、红五类，是无产阶级的后代，几乎没有出身不好的人敢接近我们。我们所熟悉的话题都是怎样成立红卫兵，怎样和当地的“走资派”做斗争。如果在文革前我最希望听到的就是他这样的话，如今突然听到这样个陌生的年轻人初次见面就表示与“反动家庭”决裂，诧异之余，我也为他的革命立场所感动，可是我又有何可说的呢？自己内心深处还是一堆糊涂帐呢。毛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把人性中最恶的潘多拉瓶子打开了，人们内心深处仅存的一点点良知和理性，都已经迅速的土崩瓦解了。

◇ 西纠

8月下旬，在学校里听说有人提议成立红卫兵纠察队。或许提出这个倡议的人，看到社会的混乱多是红卫兵乱来造成的，于是想起了大革命时期的工人纠察队、农民纠察队吧。我们由于外出串联心切，无暇关心此事。考虑到路上能听到中央电台的广播，及时了解北京的形势，我去九三学社找罗旭东借一个小收音机，从他处证实确有此动议。罗旭东从会议室里出来，递给我收音机的同时告诉我，他们一些人正在里面开会，商量成立“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后简称“西纠”）的事。拿了收音机，我没多问，扭头就走，我的心早已飞到松花江畔了。

一个星期左右，从哈尔滨回到北京，我很快去了西纠总部，那时西纠总部在西四的一个胡同里，后来说是育翔小学的校址。这是我第一次走出自己学校的大门，开始跨校的活动。在这里认识了许多外校的人，如四中的孔丹、王向荣、赵胜利、孔栋，六中的董良翮、黎胜利，四十一中的张北英、张海生、何迪、苏小林（我们两家熟得不能再熟了）、梁启旺，十三中的栗寒生，那个一天到晚开着一辆摩托车的郭冀豫和一天到晚站在胡同里发传单的白乃光。还有外校的女生，丰盛中学的邢燕平、张立文、兰小兵、骆小峰。也是在西纠总部，我认识了后来成为我爱人的李晓林。

西纠队员许多是我们八中的。初三的王东胜带了几十个八中的红卫兵，常驻在那里，我还有印象的一个是王亚南，一个是廖建国，他们都是初中年级的学生，一天到晚围在我身边讨论这个讨论那个。另外还有许多人都叫不上名字了。

我去西纠的时候是9月份，当时在西纠总部管事的3个人，是四中的孔丹、王向荣和赵胜利。我后来一直纳闷，印象中西纠是由我们学校吴新潮、罗旭东和郝延塔发起的，怎么成立没几天，主事人都成了四中的呢？近年看到陈小鲁的文革回忆，才知最初是小鲁发起的。那时候，西纠接受了政府交给的安置外地来京红卫兵的任务，那可是个极其繁重的任务。小鲁带领一部分西纠队员坐镇位于北京火车站的“外地红卫兵接待站”，这样总部就只能由这几个四中的人来主事了。西纠本不是个有规章的组织，红卫兵把这样一个组织，当作可能的一种资源，来做红卫兵觉得应该做的事。四中的人比我们八中有更多的政治资源和上层联系，也更懂得如何与上面合作，自然许多事情都得他们主持。我在西纠参与的工作主要是两件，一件是10月1日国庆节的天安门广场值勤，一件是编写西纠通令。我去的时候，西纠通令已经出到十几号了。我参与的是十一号还是十三号，记不清了，内容是关于红卫兵串联需要注意的事项。

1966年国庆节即将来临，西纠领受了国庆节天安门广场值勤的任务，小鲁也从火车站回来了。我们全体上下，着实开始了紧张的工作。记得我和袁塞陆还去北京卫戍区接洽后勤物资保障方面的工作，多少被子以及具体安排之类。“十一”当天我们西纠的指挥部设在中山公园大门里，有大粥锅、果子面包、开水桶等等。大家忙得焦头烂额。我在后勤组，前前后后送水。我们学校的杨树东负责指挥天安门一侧最外面的标兵线，他自己站的时间太久了，可能是中暑，竟直挺挺栽倒在地上，急救也成了一项工作。毛主席和中央首长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游行队伍像潮水一样，一波连着一波。到了晚上毛主席走下金水桥，硬要走进沸腾到极点的人群中去。我们西纠队员组成值勤防线，很多人都累了一天了，依然精神抖擞。人群太拥挤，人人想见毛主席，人人都想挤到前面，想亲眼见到毛主席的愿望几乎到了疯狂的地步。有时我们的防线也被冲的东倒西歪，溃不成军。我亲眼看见一个毛主席的贴身卫士被拦在了防线的另一侧，他发疯似地要冲过防线，追上走在前面的毛主席和林彪一行人，撕扯之间，腰上别的手枪都露了出来。

这段时间，西纠也出面阻止过一些群众组织的静坐请愿活动。前因后果已有许多文章回顾研究。我参与过一次行动，应该是1966年9月里一天的深夜，我们常驻总部的西纠队员奉命全体集合赶往国防科工委办公大楼，地点是现在解放军三总部所在的平安里那边。据说是北航造反派在那儿静坐了许多天了，我们的任务就是说服他们撤出。我们八中的西纠队员全去了，初三的王东胜带队。我是乘郭冀豫开的摩托去的。头头儿里，好像孔丹、赵胜利、孔栋都去了。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造反派组织在政府机关门前的静坐活动。我们的队员都在卡车里等候，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夜色中双方头头儿在接触。9月的夜晚，天气已经凉了，我跑到前面去看情况如何，见孔丹和孔栋讲完电话走出来，叫我们撤离现场，回西纠总部。

“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是文革中一个非常有争议的组织。它是老红卫兵发起的，也的确得到了政府方面的支持，因为在那个时期，社会秩序非常混乱，政府自然希望利用群众组织维持公共秩序。但是这样的组织，从文革初期的政治势头、家庭背景、人员构成以及后面运动的走向来看，显然属于保守派。这种具有强烈政治倾向性的组织必然会被当时的政府机构操控和利用，成为文革某个时期、某种政治力量的工具，其中一些人在社会上还做了坏事。所有这一切，我认为总体上应该由当时的文革路线来负责。对西纠所做的具体事情，则应该一事一议。

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走资派运动的深入，西纠这种组织很快就不再适应运动的发展，也失去了政府的有力支持（我们西纠总部的汽车、摩托，直至服务人员、被服、伙食等等都是北京卫戍区提供的。我至今似乎还能闻到那些深绿色的崭新军被的味道。有段时间，我们几个人还一天到晚去中南海西门拦截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的车，无非是要求得到政府的继续支持），西纠存在下去的可能性几乎就没有了，没几个月的时间就解散了。

#### ◇ 逍遥派

红卫兵是从北京的中学兴起的，随着文革运动向大专院校发展和在全国铺开，中学反而陷入了停顿状态，去学校的学生越来越少。我们老红卫兵，从1966年的秋冬之后，逐步成了逍遥派。许多老红卫兵自己家里也出事了，有的家长被打成走资派，遭到群众揪斗；有的家长尽管还没被揪出，可也成了惊弓之鸟，处在朝不保夕的恐慌中。老红卫兵对文革越来越失去了兴趣。

我在这段时间里基本上就是个逍遥派。当然也不是什么都不做，我和王小民、李晓林、张立文、宋淑英和雍玲玲在1966年的10月、11月一起去南方串联，韶山、成都、重庆、武汉等地，一路千辛万苦。我们也深入到农村，感受了农民的生活。我们看了刘文彩庄园的展览，还采访了一个据说解放前受过刘文彩剥削压迫的老妈妈。去了毛主席的家乡韶山冲，在那里住了几天。有一天突然看到一张大字报，讲的是西纠的兰某某和骆某某如何如何，说是被中央文革给抓起来了，这不是说兰小兵、骆小峰吗？我们走的时候，就是她俩在西纠看家，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们立刻打道回府，回到北京已经12月了。一看两人好好的，才松了一口气。大概在1966年12月左右，一些西纠的老红卫兵希望能重新组织起来，成立了西纠联络站，不过大势已去，西纠联络站也就是秋后的蚂蚱吧。

作为红卫兵，我们还是希望能继续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把教育革命搞起来，因为教育革命是中学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部分。自从一起串联后，我和王小民就开始讨论此事，我们两家关系很好，又是同年级同学，所以我俩经常聚在一起。他父亲为了躲开造反派，被周总理安排在中南海里，我和他时不时去中南海给他爸爸送大米（那时粮食按人口定量供应）。一来二去，我们就对教育革命有了共同的看法，认为重要的就是要寻找一条与贫下中农相结合办

教育的路。于是我带上我弟弟小运，他带上他弟弟小弟，我们4人来到北京西北郊一个叫东北旺的村子里住下，一边参加劳动，一边接触当地农民，一边思考如何推进中学的教育革命。李晓林、张立文还从城里骑自行车跑来看我们。

在党中央发出“复课闹革命”的号召后，我们到街上去刷有关教育革命的大字报，根据几个月来自己的认识，我想出了一句口号，斗大的字贴在墙上：“教育革命，百年大计，红卫兵当仁不让”，尽管这个口号充满了派性的火药味，但起码说明我的红卫兵激情还未熄灭，理想的火花仍在闪耀。

1967这一年，我基本上就是待在家里，有时为响应复课号召，去学校看看。那时学校已是四三派、四四派互斗的局面了，“复课闹革命”根本没可能。这个时期我和闫增武，我们班团支部的组织委员，几乎天天泡在一起，海阔天空，聊形势，聊政治，聊今后，无事不聊。我还学会了吹笛子和拉小提琴，一天到晚宅在家里，过个把天去学校陪班级的军训干部闲聊。虽然学校里一片冷清，此时神州大地的许多地方，已经炮声隆隆、烽火连连、杀声四起了。

班里掌权的四三、四四派也组织过一些社会活动，我们也就跟着参加。去过东郊木材厂劳动，住在那里，和工人同住同劳动。在那儿我们认识了李瑞环，那时他已经被打倒，正在这个厂子里劳动改造。我们和他住一个宿舍，他经常和我们聊当年他如何从一个普通工人成长为干部和毛著学习标兵的故事，他讲起那些故事，又具体，又风趣，我们都非常爱听。这期间，李晓林、张立文还蹬自行车从城里来看我。

我在学校里还办了一个小报，自己刻蜡版，自己印刷，然后贴到学校的墙报栏。我们班同学张润德最近回忆说，我在自己办的小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历史的必然和必须》（我自己想不起来了），大致是说，我们老兵犯错误，现在轮到你们新上来的造反派，特别是四三派开始犯同样的错误了。犯错误是必然的，认真改正错误是必须的，云云。他还回忆说，我（针对造反派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说过“小资批小资”，当时很多四三派同学对我这话不满意，说明那时我们中学生的思想依然陷在派别争斗里。

近年在历史研究的思潮中，即使同样是反思文革，却出现了截然不同的观点派别，人们不能求同存异，团结起来推动社会理性的进步，而是出现了针锋相对、水火不相容的对立，这种对立出现在我们一代同龄人身上，出现在我们这些文革亲历者身上，除了现实因素外，必定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人群严重撕裂的根源，必定在那个疯狂的文革年代。

改革开放走到今天，社会的各个阶层如果能彻底反思文革，探究真相，厘清曲直，捐弃前嫌，认清社会的共同底线，取得共识，唯一的途径就是坐到一起，理性、客观、冷静地回顾那段历史经历，找到毒害我们思想意识、撕裂我们同学感情、造成我们人群四分五裂的根本原因。这将是一件非常有现实意义的事情。

我的中学年代，随着我1968年参军入伍就结束了。那以后很长时间都没有再和同学们联系，直到1990年代后期。

□ 原载《熊窝》网站

~~~~~

【史海钩沉】

清华大学727事件（六）

(上接 z k 1 7 0 7 a)

#### ◇ 毛泽东变化，大转折完成

邓小平说：毛在，毛说了算。这句话准确而精辟的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真实。只要毛在世一天，中国的事情全都得看他的脸色，中国的天空随着他的喜怒哀乐而阴晴圆缺。

#### 一、心态变化：从小骂蒯大富到大骂聂元梓

##### (一) 变化体现一些谈话及批示中

毛泽东当然不可能告诉你，他看了简报，听了汇报后有哪些新发现、新体会和新变化；更不会告诉你，他认识到过去哪些做法是脱离实际的，哪些是片面的，哪些是错误的。

毛泽东心态及认识上的变化体现在一系列谈话及文件的批示中。

8月8日下午，毛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吴德等谈话时说：“清华两大派打，有什么自由？……他们都是武斗集团，不知有多少个中心。所谓‘五大领袖’，群众不信任他们，工人、农民、士兵不信任他们，学生不信任他们，本派的大部分人不信任他们，只有几百人能勉强控制，怎么行呢？……当了什么委员、副主任，就不得了喽！”

显然，这里所说的“什么委员”指的正是蒯大富、韩爱晶等所担任的“北京市革委会委员”；所说的“副主任”指的正是聂元梓的“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

显然，毛认为“五大领袖”的“红卫兵政权”已经成为“武斗集团”，是具有独裁性质的“独立王国”，在这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里，蒯聂一类的极少数极端极左的造反派领袖统治一切，毛的指示被肆意歪曲，毛的战略部署被弃置不理，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不到那里。

所以毛的结论是：必须批判反动的“多中心论”。

什么是反动的“多中心论”，就是指清华的“蒯大富中心”，北大的“聂元梓中心”、北航的“韩爱晶中心”等等。“蒯司令”可以叫，“老佛爷”也可以叫，但谁也不能成“中心”，只能是“爪牙”。谁想将自己搞成“中心”，那就“爪牙”也当不成。

8月13日下午，毛泽东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马列）代表团时毛泽东说：现在中国红卫兵有一种思潮，旧的东西一概要否定，这种思潮是不对的。马克思不是这样。

这段话表明毛对以“彻底砸烂旧清华”这两句口号为代表的蒯大富一伙“极左思潮”的批判。而就在几天前的“7 2 8谈话”中，毛还曾为“彻底砸烂旧清华”作了一段毫无说服力的辩护。

我们列举这些讲话并非用于堆砌，而是从这些材料中去分析毛思想变化的路径与过程，他在什么时间变化到了什么程度了？

## （二）对清华两派不再坚持 2 比 1

8 月 15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金沙水拍云崖暖——热烈欢呼云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引用了毛泽东最近的一段话：“我国有七亿人口，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要充分发挥工人阶级在文化大革命中和一切工作中的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应当在斗争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政治觉悟。”

这段话表明在毛的心中“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思想通过重复、加强，而越来越鲜明了。而在“7 28 谈话”中，工宣队还只是一个“制止武斗”的工具，“领导一切”的思想还没有出现，更谈不上清晰。

8 月 15 日，毛泽东大规模地接见工宣队代表并听取他们的有关汇报，授意工宣队管理清华大学。

这些举措给了工宣队极大鼓舞，同时也更加明确了要由工宣队来“亲手”结束清华井冈山兵团及两派的“寿命”。

8 月 15 日又是重要的一天，毛泽东接见工宣队与《人民日报》社论这两件事清晰地表明了毛泽东心意的变化，他已经不再坚持蒯大富当校长、沈如槐当副校长了，不再坚持“井冈山出两人，四一四出一人”，也不再提及：“蒯大富是偏左的……四一四右的。”当工宣队将清华大联委 1 6 比 1 5 的方案报上去时（当然，这样具体的方案，工宣队也不一定会汇报，但在事后，毛泽东一定是知道的），毛泽东已经不再坚持二比一了，他对为蒯大富争名额已经毫无兴趣了。

8 月 16 日，清华两派红卫兵组织解散，成立大联委。大联委的委员名额按 1 6：1 5 分配。经过整整一年的斗争，4 1 4 最终争取到了一个“对等”的比例，这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胜利，已经没有现实意义了。

## （三）从“小骂蒯大富”到“大骂聂元梓”

毛泽东关心清华的同时没有忘了北大，他对北大也作了很多指示。

1969 年 3 月，毛泽东指示说（工宣队）“可以进了”。于是于 3 月 24 日派了 8 3 4 1 部队政委杨德中、副政委王连龙率 85 人的宣传队开进北大，并指示他们在两个月内只做调查，不吭气。

在这两个月内，8 3 4 1 部队派去的简报组以及市委三支两军办公室的同志将调查研究的情况不断地形成材料向毛泽东呈送。

两个月后，毛泽东指示说（工宣队）“可以表态了”。于是先由负责人王连龙在全校大会上狠批了一通聂元梓和北大“校文革”的极左行为。而聂元梓与北大“校文革”的一些头头和 7 27、7 28 后的蒯大富一样，总是死到临头不服气。聂元梓拿出过去的小本本来寻找并宣传有利于自己的证据：谁谁曾支持他们，谁谁讲过什么话等等。



谢静宜说：“每天的简报不断上送，主席都看了”。毛泽东从简报及谢静宜的汇报中获悉聂元梓的态度，立即将她叫回去，当着小谢的面大骂、臭骂了一通聂元梓，并让小谢将他的话完完整整地记下来：

主席气愤地说：“你‘老佛爷’伸手伸到石家庄，伸手伸到华北局，不知道羞耻！”

“你们自称是红色政权，你红在哪里？你就没有黑的吗？你们就是有黑的！”

“你们是大学，是有知识的人哪，才没知识呢！”

“你们是文明单位呀，才不文明呢！穿着盔甲，拿着长矛搞武斗，不知道羞耻！”

“你们说你们是听我的话的，你们听了么？我叫你们文斗，你们就搞武斗。我叫你们大联合，你们就搞分裂。我叫你们严禁逼供信，你们就把人往死里打。你们打的是好人还是坏人啊？你们打的是好人，而不是坏人；你们打的是阶级兄弟，而不是阶级敌人。”

主席越讲越气愤，声音也越大，怒不可遏。主席稍停，歇息片刻接着说：“你们今天，又翻起过去的小本子来压人。人家一批评，你们就翻开小本子（过去的记录本）说，谁谁讲话肯定过你们，这个人承认过你们，那个人承认过你们，我就没承认过。翻那个小本子干什么？若是你们有理，得人心，不翻小本子人们也自然会承认你们。现在又翻起过去的本子来，说明群众对你们不满，你们做的事不得人心，无非拿过去谁谁讲话压人。现在群众对你们干的事不满意，不得人心，翻本子也没用。”

“即使过去谁谁肯定过你们，那是肯定你们以前做得对的地方，没有肯定你们的错误。”

“你，‘老佛爷’是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

“‘文革’、‘文革’（指当时北大‘校文革’），一不文化，二不革命，还革什么命啊，我看你们是一派的‘文革’、逼供信的‘文革’、武斗的‘文革’！”

好一顿大骂、臭骂！酣畅淋漓、雷霆万钧！骂得好！骂得痛快！

可是他也不想想，这样的聂元梓又是谁制造出来的？

毛泽东骂完了，尚觉未尽兴，明确指示谢静宜回北大，将他说的这些话变成她自己的话在大会上去骂聂元梓。

“主席当时气愤地从坐着批评，到站起来批评。他在厅中来回踱步，坐下对我说：‘小谢，把我刚才说的这番话，在北大召开的全体大会上，由你去讲。’

我吃惊地抬头望着主席说：‘主席，这是你老人家的话呀，我怎么能去讲啊？’

主席说：‘能讲的，你变成自己的口气说就是了。’”

毛泽东大骂聂元梓的内容有三点：搞武斗；逼供信；不承认错误。

请大家仔细看一看：如果将上述讲话中的“北大”置换成“清华”，将“聂元梓”置换为“蒯大富”，那么“大骂聂元梓”就成了“大骂蒯大富”。除了第三点有点对不上号，其余两点的具体内容，清华蒯大富都超出了北大聂元梓。

“大骂聂元梓”发生在1969年的5、6月份，那时距“728”已经八、九个月了。此前，毛泽东有没有骂蒯大富啊？

早在1968年7月24日上午，毛泽东在召见谢静宜时已经就是这样一种骂法了：“聂元梓、蒯大富这些人在搞武斗，谁的话都不听，市委的话不听，中央的话不听，我的话

也不听。他们穿着盔甲，拿着长矛搞武斗，不知道羞耻。”“他们脱离了工人，脱离了农民，也脱离了他们本派的大多数。他们头脑膨胀、全身浮肿……”

“7 2 8 谈话”中也骂了蒯大富，骂他“蠢”，骂他“全身膨胀，害浮肿病”。

但比起这次“大骂聂元梓”，那几次只能算是“小骂蒯大富”。

人的思想变化是有过程的，人的情绪也是慢慢积累的。毛泽东“大骂聂元梓”所表现的愤激情绪正是从“小骂蒯大富”开始积累的。

“清华7 2 7 事件”也是一把双刃剑，不仅伤了蒯大富，同时也伤了毛泽东。

蒯大富“一气毛泽东”在先，聂元梓“再气毛泽东”在后，一个是“我们的老佛爷”，一个是“我们的蒯司令”，这一男一女、一老一少的两个“大活宝”让“我们的老人家”伤透了心，失透了望，气得他忍无可忍，他也要渲泄，他也要“吐槽”，终于暴出了“大骂聂元梓”。

（四）决心将清华抓在自己的手里

8月17日晚上，毛泽东听取林彪、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汇报工作。当汇报到清华两派已经联合起来时，毛泽东说：“清华联合起来是大势所趋，不联合不行。清华这个学校，我们一定要占领，搞到底，搞到它斗批改为止。”

从此，在毛的直接领导下，迟群、谢静宜掌控清华长达八年的时代开始了。这一男一女两个“新活宝”在清华又制造了无数人间悲剧、清华悲剧、教育悲剧。不要以为这是毛泽东的终极思考，只要他活着，他还会在思考，其必然结果也一定会让老人家又一次伤透心，失透望的。不过没有等到那一天“我们的老人家”自己走了。

二、理论上的创新：姚文元文章的修改与发表

（一）精心布置，精心修改，顿生林啸之风

8月19日，毛泽东同中共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成员谈话时说“今年下半年，整顿、教育是差不多了，是时候了”。随后，毛泽东指示姚文元写出“宜有一篇指导当前政治的文章”。

8月22日，姚文元写成《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一文送给毛泽东审阅。

8月22、23、24，毛连续三天三次审阅修改。不仅在内容上作了精心修改，而且在文章题目、署名及发表程序，全都作了精心布置。

毛泽东首先大笔一挥，将题目改成《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

毛真不愧是中国白话文的第一高手，标题这么轻轻一改，整篇文章顿生林啸之风，不仅气势如虹，而且权威无限。

一百年后，谁还记得姚胖子的这篇文章，但是老爷子的“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永垂不朽。

毛又批示：“此文由你署名，在《红旗》先发，然后由各报转载并广播。请向碰头会宣读一次，征求意见。”

## （二）五点修改

### 1、核心内容：工人阶级是永远的、唯一的领导

姚文的核心内容就是毛泽东为文章所确定的标题“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以及文中所公布的最新指示：“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来，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直至此时，毛泽东这才明确工宣队要在学校长期留下来。而在此前，虽在7 2 7派了工宣队，但对于工宣队的去留问题是没有预案也没有预测的。如果7 2 7那天工宣队制止武斗顺利的话，他们当天就可能回本单位，只会留下少数领导与骨干处理后续事宜。正是因为蒯大富们的“抵抗还击”的行动与造成的后果，不仅使得工宣队骑虎难下，也使得毛泽东骑虎难下了，最终使得工宣队留了下来。

强调了“永远”还不够，还要强调“唯一”。

毛将原文中的“坚持工人阶级领导”，改为“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将原文第四段，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进行的”，改为“仅仅是在工人阶级这个唯一的阶级领导下进行的”。

### 2、“惊天动地”也是“史无前例”

接着，毛泽东又为“工人进驻学校”写上了一段委婉的理由：

“工人宣传队进入教育阵地，这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自古以来，学校这个地方，就是为剥削阶级及其子女所垄断。解放以后，好了一些，但基本上还是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垄断。从这些学校出来的学生，有些人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原因大概是：或本人比较好，或教师比较好，或受了家庭、亲戚、朋友的影响，而主要的是受社会的影响）能同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有一些人则不能。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内，存在着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严重现象。在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奋起造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学校中的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暂时地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但随后不久，有些人又暗地活动起来，挑动群众斗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破坏斗、批、改，破坏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破坏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和整党的工作。这种情况下，单靠学生、知识分子不能完成教育战线的斗、批、改及其他一系列任务，必须有工人、解放军参加，必须有工人阶级的坚强领导。”

这一段是毛加写和改写的，显然动了不少脑筋。从“自古以来”讲起，经过“解放以后，好了一些”的过程，又经过文革开始时的“沉重打击”，但“随后不久”的曲折与反复，自圆其说地说明了“工人宣传队进入教育阵地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这段话在发表时用着重号标明，虽然没有用“史无前例”，实际上当然是“史无前例”。

### 3、再次痛斥红卫兵造反派

毛泽东在“一切无产阶级革命派都把工人阶级当作‘自己’人……”这句话中的“一切”后面，加写“真正的而非口头说说骗人的”。在这段话之后，毛泽东又加写了一段话：“有些自己宣布自己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知识分子，一遇到工人阶级触动他那个小小的‘独立王国’的利益的时候，就反对起工人来了。这种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在中国还是不少的。这种人就是所谓轻视工农、爱摆架子、自以为了不起的人物，而其实不过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不论是学校，还是别的单位，都应有工人、解放军开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占领那些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占领那些‘多中心即无中心’论者盘踞的地方。这样，成堆的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健康的空气、作风和想法就可以改变，他们也就有可能得到改造和解放。”

毛又一次宣泄了心中愤怒。在他愤怒的笔下，蒯这一类造反派原来就是“口头上说说，骗骗人”；而这些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知识分子”原来都是“现代的一批叶公而已”，他们所搞的仍然是“独立王国”，“多中心即无中心”。他还又创造了一个新名词“成堆的知识分子”。从此知识分子又多了一个紧箍咒：“成堆”。

### 4、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

毛为文章加写了第三段：“自从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开始形成的时候起，就提出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口号，到今天已经一百二十年了。只有帝国主义、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新老修正主义者才反对这个彻底革命的口号。中国共产党是以这个口号为其基本纲领的。而要实现这个口号，就要联合工人以外的广大群众，这主要是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以及有可能改造的知识分子，并领导他们前进。”

这样一来，“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口号就与马克思主义挂钩了，与“无产阶级专政”挂钩了。而知识分子的地位再次下降成“有可能改造的”。而“有可能”就是比“可能”更小的可能。

### 5、放弃“史无前例”的提法

毛泽东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史无前例的”五个字删去，并批注道：“以后不要说史无前例。历史上最大的几次文化大革命是发明火，发明蒸汽机和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不是我们的革命。”

那么“我们的革命”是什么呢？毛没有讲。总之他是谦虚了一回，这也是晚年的毛泽东思想中值得称道的地方之一。

## 三、大转折完成

（一）大转折过程：十节点，第2根函数曲线，

许多文革研究者认为“清华7 2 7事件”标志着“红卫兵运动的终结”。

其实这是一种正确而不准确的说法。

之所以说它“不准确”，有下列四点理由：

1.毛泽东的“7 2 8谈话”虽然对蒯大富的表现很失望，但同时也很呵护。毛泽东并没有严厉的批评与指责，相反却说“错误不要再提了”。这不仅表明他对蒯大富“旧情未断”，而且也是想将蒯包庇过关的。

2.毛泽东仍然说“没有蒯大富是不行的”，并具体地指明蒯大富当校长，沈如槐当副校长。蒯与沈都是贫下中农出身的红卫兵。这表明毛不仅看重“出身”，而且仍然看重“造反”。

3.毛泽东对工宣队的伤亡也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关切，说明在他的心目中工宣队还没有占据主导地位。

4.毛泽东在“7 2 8谈话”结束时委托谢富治、吴德制止清华武斗，说明毛还没有将大权直接交给工宣队。

之所以说它又是“正确”的？

因为毛泽东最终抛弃红卫兵造反派仍然是由于“7 2 7事件”中的动因与后果的持续发酵而形成的。

我们认为：所谓的“红卫兵运动终结”并不是一朝一夕、一天一事的事，而是经历了一个时期。我们将此称之为“转折期”，完整的表达是：“从红卫兵运动终结到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舞台”的大转折时期。

我们认为：将“七三布告”的发布看作是这个“转折期”的起点是比较恰当的；同样，将8月25日姚文元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发表看作是终点也是比较恰当的。在起点与终点间相隔54天（又一个“50天”！），期间有10个节点：

- 1.7月3日，“七三布告”的的颁发及广西等地武斗的加剧；
- 2.7月17—19日，历时三天的“清华—北航黑会”；
- 3.7月24日，“七二四布告”的颁发及“清华7 2 7行动”的策划；
- 4.7月25日，中央首长接见广西代表，标志着中央高层意见统一；
- 5.清华7 2 7事件，红卫兵政权残暴性与欺骗性的集中、彻底暴露；
- 6.毛泽东“7 2 8谈话”，毛泽东举棋未定，但倾向性日趋明显；
- 7.毛泽东“8 5送芒果”；工宣队站稳脚跟，毛泽东倾向性明显；
- 8.毛泽东“8 1 5接见工宣队”；方向已确定。
- 9.8月16日，全国红卫兵造反派标志的“清华井冈山”消亡；
- 10.8月25日，姚文元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发表。

十件大事，十个节点，描绘出了“大转折期”的一根平滑、连续、斜率不断变化的曲线，此未落而彼又起，环环相扣、跌宕起伏、精彩纷呈。直到8月25日姚文元文章公开发表，这个大转折期才缓慢地、沉重地落下一个句号。

也只有到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说：大局已定，“造反派”彻底完蛋了；以“造反派”为标志的“红卫兵运动”结束了；以“红卫兵运动”为标志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终结了。

这是本书所列出的第二根  $y=f(x)$  的函数曲线，第一根是时间曲线，第二根曲线既有时间，但侧重是事件曲线。第二根才是最重要的。

## （二）大转折条件：两要素：

### 1、行动上有了新常态

8月25日，毛泽东批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学校的通知》。

《通知》一开始就摘录毛泽东8月15日指示，指出根据这一指示及进驻大学的北京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已经获得的显著成效，在全国发生的巨大影响，“中央认为：整顿教育，时机到了”，决定“抽调当地产业工人十分之一左右，或更少一点”向全国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派出领导各个学校文革的工宣队，“先进大学，后进中小学。没有两派组织，也没有武斗的学校，也要进入。”

“7·27事件”一个月后的8月29日，全北京59所大专院校（包括10所艺术学校）全部进驻了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9月2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根据毛泽东指示“如工人条件成熟，所有军事院校均应派工人随同军管人员进去，打破知识分子独霸的一统天下”，联合发布通知，向军事院校派驻工人，并对尚未联合起来的军事院校实行军管。

9月5日，毛泽东又批示“照办”北京市革委关于选派工宣队的几条规定。

9月6日，中央又转发北京市《关于召开工人和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会议情况报告》。从此，“宣传队”代替“红卫兵”成为文革“新介体”，派驻宣传队成为文革新常态。大学派，中学派，小学派，教育文化单位都要派；城市派的叫工宣队，农村派的叫“贫宣队”。

### 2、理论上有了新套套

有人说：毛泽东办任何事先讲主义；邓小平则是先要搞饭吃。

搞任何运动都得有理论，这确实是毛泽东思想方法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特征。没有新理论就不能说旧运动的结束；没有新理论也不能说新运动的开始。

毛泽东通过姚文元文章确立了文革新理论。这个新理论是什么？我们当初就不清楚；当初我们在工宣队领导的学习班专门学习姚文，整整学了几个月，一直学到毕业分配，天天就干这一件事，有什么收获吗？一句话：越学越糊涂。

但是，你可以什么也记不住，也可以什么也不理解，记住了“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这句话，这就行了。

有了这句话，工人阶级就成为“永远的”、“唯一的”领导阶级，工人们在一切领域都可以昂首阔步；知识分子正式成为“臭老九”。

在后八年的文革中，“造反有理”不再是经典，“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也不再是经典，“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才是新的经典。

什么叫做“经典”？常念为经，常说为典，经得起后人不断地“说学逗唱”。

所以说，姚文的发表确实标志着毛泽东从行动上、思想上、理论上完成了“红卫兵运动”的终结，“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的开始。

人们习惯于说“思想要落实在行动上”，“理论要落实在实践上”，这仅是对群众而言。在毛那里，这种习惯说法就不能成立，因为他本身就是理论的创始者。在毛那里，先有思想倾向，包括灵机一动与心血来潮，有了思想倾向就会有行动；但当思想倾向仅仅是倾向时，行动就不是得力的，甚至会有反复；只有当“思想倾向”上升为“思想定向”时，措施才会得力，行动才会利落；而当行动有了比较明显成果，毛泽东才会将其上升为理论；理论一旦形成，转折期才算完成。以后的事只是在新理论指导下的新实践，直至下一个“转折”出现。

#### 四、大转折后的大进展

##### （一）7 2 7 后 4 0 天，全国山河一片红

7 2 7 前形势差强人意，7 2 7 后形势强如人意，比人们预想的还要快。

1 9 6 8 年 8 月 1 0、1 4、2 0、2 8、9 月 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相继批准云南、福建、广西、西藏和新疆成立革命委员会。9 月 7 日，新疆、西藏革命委员会同一天成立。这样，全国除台湾省以外的二十九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都已成立革命委员会，这就是所谓的“全国山河一片红”。1 9 4 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全国山河一片红”了，1 9 6 8 年这一回是又“红”了一次，红了一次又一次。

9 月 7 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名发表社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万岁》，社论说：“天山南北凯歌嘹亮，西藏高原阳光灿烂”，“标志着整个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进入了斗、批、改阶段。”

而这个所谓的“斗、批、改”阶段规定是在本单位、本部门的封闭式的“被窝里”的阶级斗争，全社会的群众性的运动从此结束。

##### （二）7 2 7 后 7 0 多天，八届 1 2 中全会召开

毛泽东立刻提出：“全国一片红了，中央什么时候开九大？”

当然，要召开九大先要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于是在 1 9 6 8 年 1 0 月 1 3 日至 3 1 日，八届 1 2 中全会召开了。

全会确认了毛泽东的一系列“正确”以及所有的、全面的“正确”：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是正确的；“十六条”是正确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是正确的；“工人阶级登上上层建筑舞台”当然也是正确的。

全会通过的新党章说：“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及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将林彪接班人的地位写进党章是江青坚持，毛泽东经过一夜的思考才勉强同意的。在这个问题上似乎看不出江青的建议是毛泽东授意的；也看不出这是所谓的“江青集团”与“林彪集团”勾搭成奸、相互利用的结果。

1968年10月31日，十二中全会的最后一天通过决议，批准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对于刘少奇“问题”的性质认定及对刘少奇的处理结论，充分体现了一个人的反复无常与刻薄寡恩。

在文革发动阶段，他在1966年8月虽然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虽然将刘少奇的“错误”一步上升为“路线错误”，但毕竟仍然是在党内。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还说：“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1967年1月17日，毛泽东在谈到选九大中央委员时仍然说：“刘、邓是不是能选上？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

到了1967年3月份，毛的态度突然发生了变化，原因是在这个时间段找到了新的突破口。此时的江青控制了“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集中力量“狠抓刘少奇自首变节问题”。仅仅是在4个月后，毛泽东的口风就全变了。1967年8月，毛泽东说：“刘少奇的问题不简单，不单是思想右倾的问题，他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至少四次被捕。现在有人证明，他是向敌人自首过。所以一九三六年在北方局保叛徒出狱，不是偶然的。”1968年5月20日，他说：“刘少奇这个案子，现在差不多了。”

“差不多”的结论一下，接下来的过程就是走程序。

“八届十二中全会”树林彪为“接班人”，写进党章；定刘少奇为“叛徒，开除党籍”这一立一破两个亮点外，“关于知识分子”在全会决议中如是说：“要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关于工宣队”如是说：“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来，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三）727后8个月，九大召开

八届12中全会中本来就是为九大做准备的，12中全会所解决的各项问题都比较顺利，并没有产生原则性的大分歧。但是“九大”就大不一样了。九大是一次权力再分配的会议。

1969年4月1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1152人，代表全国2200万党员。



毛泽东主持开幕会议并讲话。他说：经过八大到现在，对一些人的政治历史搞得比较清楚了，在政治路线上，组织路线上，思想方面，都搞得比较清楚。因此，我们希望这一次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在这个团结的基础上，我们能不能取得胜利？就这个大会来说，能不能开成一个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能不能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以为，可以的。可以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

历史证明：九大并没有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会后也没有去争取更大的胜利。

还记得本书第一篇第一节所引用的毛泽东的那句话吗？

毛泽东说：“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那是毛泽东在1965年11月召开的中央会议上讲的。

三年过去了，经过了三年的天翻地覆的文化大革命，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在血与火里闯荡了三年，这个“修正主义尾巴”的问题解决得怎么样啊？

解决得很好呀！

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已被打倒了，而且也已经被再踏上一只脚，在人世间就被贴上“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标签的刘少奇注定永坠“阿鼻之狱”，永世不得翻身了；

人世间的接班人已经换上了“万寿无疆”的亲密战友“永远健康”的林彪了，而且还被写上了党章。“传位诏书”不是安放在“光明正大”的匾额后，而是已经诏告九州万方了，千秋万代，一统江山，稳稳当当。

老百姓全都以为“尾巴”的问题已经是彻底解决了，只有伟大领袖心中有数，他知道这个问题并远远没有解决啊！

所以仍然“我不干”。三年过去了，离见马克思又近了三年，时间紧迫得紧。

只是我们的这本书也只能写到这里了。

（连载完）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